

“一带一路”：区域民俗音乐文化的机遇与挑战

李宝杰

民俗音乐文化不同于精英音乐文化，它的存在是在民众中广泛流行并备受喜爱的带有地质意义的文化的一种。它的主体在广大乡村社会中，是在以乡村社会为代表的民俗活动中建构的、与民俗活动事象共生、密切联系的音乐文化类型。民俗音乐文化具有区域普适性和浓厚的乡土趣味性，往往与一隅一地的文化风尚交相辉映。

中国现代经济文化社会迅猛发展，广大乡村社会快速并入城镇化轨道，拼命吸附和享用现代工业社会、经济社会、信息社会带来的各种“新文明”，将千百年来积习而成的以广大乡村社会为建基的民俗风尚不断抛弃，蕴含在其中的文化精神随之离析，传统文化记忆随之淡薄。延续上千年的乡村文化走向衰落，现代“新文明”不断兑冲着久经历史沉淀的地方区域文化特色。包括音乐在内的区域民俗文化，在现代“新文明”前不堪一击，难有回档之力。

如果像18-19世纪早期的英国人仅仅把民俗看作“民间的古俗”或“贱民的古俗”，而不注意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于1846年提出“Folklore”一词所内涵的“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之深意，以及后来美国学者萨姆纳所延伸出来的人类团体行为、方式、习惯之“德范”（mores）的话，那真是站在“新文明”的立场上把久已积习的民俗文化看浅了。民俗文化^①（包括音乐在内）表面上以日常民俗活动事象彰显，包括节庆活动、信仰仪式、言行归习、口传艺术等等，但深层里却体现着普通民众的精神依托和旨归，是一种在普通民众间积累、习得、传承的知识，是人类群体社会的集体精神记忆。

往往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城乡建筑，有人喻其为“城市的表情”，倘若没有特色的建筑群落，一定显现不出一个城市的丰富与生动；其次是乡音和歌调，可称之为“城市的气韵”，如果缺少了方言和乡歌，一个城市将失去乡音和韵律；再次是饮食和乡习，可视为“城市的生命”，食物满足的是生

^①地理学概念，这里借指最能够反映民众精神并与民众生活捆绑紧密的文化艺术形态。

^②转引自张士闪、耿波《艺术民俗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③转引自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附录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命能量的需求同时也深含着久已积习的生存惯性，但饮食终究是居于最基础的物质体验层面，而充盈或作用于人的精神内在的却离不开乡约和习规，这是一隅地方人特色凝聚的行为主旨，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规约着当地人的生活，主导着他们的生命态度。倘若一个地方没有了特色小吃和乡习遵从，这样的城市就没有了特色存在的根本，也就无法承载起区域文化的含义。

从建筑到乡音再到饮食、乡习，显现出人之生存的整体景观，生长于斯、生活于斯的人们融生命体验于其间，不仅塑造自己，同时也在不断地缔造着不同的文化环境。建之于其中的诸种文化类型或品种无不受此影响，以其各自的方式彰显此地彼处的不同与各自特质。

在现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下，强调区域民俗文化的存在具有格外的意义，一方面可触及不同地域民族、民俗精神的基质，另一方面可丰富和提高现代人的文化参与和体验意识。在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信息社会中，通过纵向的追溯和横向的比较，感受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意趣，才能编织出灿烂绚丽的世界文化新秩序。

一、立意与站位

那么，强调了民俗文化存在的重要性，围绕国家新近提出和倡导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发展愿景，民俗文化发展特别是区域民俗音乐文化发展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境遇？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在“一带一路”中有着什么样的立意？据此，我们才可能理清民俗音乐文化在其中的站位。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思想的缘起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下半年的两次重要出访。一次是在9月7日，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重要演讲中，首次提到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另一次是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重要演讲中，习主席又明确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此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简称为“一带一路”。

作为一种理念和倡议，“一带一路”是通过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机制，打

造区域合作平台，通过高扬历史文化符号，借助“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高度文化融合性的人类交流事实，激励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认关系，共创“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共八个方面，纲领性地阐明了“一带一路”思想倡导的基本立意和发展构架，^①是国家在21世纪致力于全面发展、建立多边合作关系的顶层设计。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在全球化时代继承了古老贸易与文明通道，更在开启陆上全球化以对冲海上全球化风险，开启文明交流互鉴以实现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繁荣，并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理念开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新文明。”^②

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开了中国与中西亚的交流通道，而事实上早在张骞之前中华文明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蔓延到了那里，当地人已经在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说明丝绸之路并非一条，中西民间交流往来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的丝绸之路虽是通商和贸易之路，但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下的却是不同文化沿丝绸之路的交相荟萃。双向交流中，从西方传来了各种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建筑）、科技（如天文、历算、医药等）和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而向外传出的则是中国制造、各种发明、艺术手法、思想等（如纺织、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工艺技术、绘画、儒道思想等）。有学者这样评价丝路文明的影响：“丝绸之路文化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文明，世界文明在丝绸之路国家是断层的和多中心的。在丝绸之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伊朗、叙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国家等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丝绸之路文化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种文化清洗和种族屠杀文化完全不一样，两千五百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

^①

中国政府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y/201504/2015040092999.shtml#2015-04-01

^②（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健在。”^①

正是这样一个“没有中心的文明”，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能够把人类的多重光辉聚集在一起，使之大家共同沐浴、相互受益。丝绸之路的发展理路显现了中国古老哲学中的“和”“合”思想，使之多种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相荟萃、延展千年。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人援引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予以印证，如李希光说：“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丝绸之路文化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杨海琳则认为：“古人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人体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我们也把这个人体看成是宇宙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应和天时，在太阳升起时我们身体中的阳气上升，当太阳下山时我们要怀柔身息，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对自然的尊重和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说远远超越世界上其他文明。”^②

远在千年前的古代人通过贸易通道开创了人类和合相处的先例，而今我们重提丝绸之路新文明，一方面是要“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搭起了两条经济带，让世界更均衡发展，推动内陆文明的复兴、海上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对接。”另一方面以此“唤醒古丝绸之路遗存的中华文化基因，通过密切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文化互认’，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说，古代的丝绸之路把东西方文明与贸易编织在了一起，“一带一路”的提出^③则是对古丝绸之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正在经历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的转型。”^④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倡导的主体是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和建立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但却充盈着包容与开放的文化理念，其交流、合作是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认同的基础上的，

^①李希光《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载《当代传播》2015年第6期。

^②李希光《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载《当代传播》2015年第6期。

^③杨海琳《“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载《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20期。

^④王义桅《“一带一路”的文明解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⑤刘京晶《加快一带一路文化建设 搭建共生共荣文明桥梁》，载《文化月刊》2015年第16期。

^⑥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由此，无论是内陆文明的复兴还是海上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对接，都离不开各地区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对此，前文提到的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之“共建原则”中就明确强调了“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不仅如此，为强调文化的作用力，在“基本框架”中专门提出“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在基本思想立意上，还规划了可操作的具体方面，如在“合作重点”的“五通”中列出“民心相通”一条，将之看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涉及了诸如开展合作办学、举办文化年、艺术节、进行精品影视剧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进行保护工作、深化人才交流、广泛开展沿丝绸之路项目、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等诸多具体方面。而在“合作机制”中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又特别提出“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由此可见，“愿景与行动”把文化交流问题放在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而在其中对有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既考虑到历史的联系性，也兼顾了传统文化在现时代如何注入新活力的问题。

显然，因与“非遗”保护的紧密关联性，不同区域的民俗音乐文化是理应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回顾中国音乐发展史，古代著名的隋唐九部、十部乐组成，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西域一路走来，或是与其他周边国家、民族的交流中形成的。这些部乐中无不保留有当地各自民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印记，从基本乐调到歌舞表演形式，诸如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正是由于其丰富而绚丽的异域色彩才赢得了隋唐宫廷的喜爱。北周武帝时期龟兹乐人苏祇婆随阿史那公主入聘带来的“五旦七调”，直接影响了隋唐音乐实践，并对此后“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产

①以上“愿景与行动”引文，均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生不无显著作用。而现今仍然存活的诸如新疆的“木卡姆”则与中亚、西亚各地的玛卡姆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从西安一路往西，诞生于陕西关中太白山麓脚下的户县、眉县一代的汉族俗曲小调，则对沿途各地的民间小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迄今仍能从甘肃的秦安小曲、通渭小曲、敦煌曲子戏以及新疆的曲子中领略到陕西曲子的基因。而陕西戏曲音乐中特殊的“苦音”调式音阶中带有中立性质的微降B、微升F，并不同于古老的汉族调式音阶体系，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其与西亚一带玛卡姆中的拉斯特调式具有某种近似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音乐现象都应该是历史上不同文化交流或融合的结果，^①并且依然在广大乡村社会文化整体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参与作用。

民俗音乐文化存在的显著特征是与各地区历史地形成的乡村民俗活动保持着一定的共生关系，不同于以城市为代表的、以演艺为目的现代社会主流音乐文化，具有自身的文化复杂性和区域限定性。然而，现代乡村人文环境及其文化生态已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乡村社会中民俗仪式、信仰活动的淡化和变异，民俗音乐文化所需的那种相对稳定的环境状态早已分崩离析，面临着多种选择。20世纪末兴起的“申遗”热似乎是一只“强心剂”，致使不少地区的民俗音乐文化一时略显活跃，但非遗保护因其本身的操作规范和约定属性，而更关注传统文化中濒临灭绝的对象和重视所保护对象的原生性、古老性，因此，并非所有民俗音乐品种都能从中受益，这就与民俗音乐文化在当下发展所需注入的普遍活力不相一致，难以从中获得大量借力。实际的情况是，各地民俗音乐文化依然在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不断被边缘化，逐渐走向凋敝。

民俗音乐文化从本质上讲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在当今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处境堪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逐渐失去原有文化生态的情况下，要保持和坚守原貌原样自然难与现代社会文明和文化风尚对接，要想适应现代社会文明需要就得寻找更多的出口和路径，才可能增加自身的发展活力。可问题是，民俗音乐文化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普遍存活于乡村社会间，是在当地文化土壤中自然地衍生与发展起来的，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呢？我以为，“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文化思想理念能给予我们不少启示。

一是“一带一路”宏观文化背景下的区域性选择的重要性。根据“愿景与行

^①王旦《苦音调式与拉斯特调式的比较研究》，载《交响》2012年第3期；《维吾尔木卡姆与西亚玛卡姆及达斯特嘎的近亲关系》，载《交响》2015年第3期。

动”所涉及八个方面的整体分析来看，“一带一路”倡导无疑是建立在国际化的宏观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但面对文化呈现出的却是不同区域的微观往来，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存在与发展，这正是不同文明丰富性的需要和直接体现，也是当今经济一体化造成的文化同质化所欠缺的。那么，作为民俗音乐文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尽量保持和坚守区域性文化特色，如此，在“一带一路”中才会呈现出微观效应及其不同文化差异呈现的重要性。

二是民俗音乐文化发展要有自我的合理定位。民俗音乐文化的自我构成离不开乡村民俗活动，就拿丝绸之路的东段——我国境内西部沿线各地为例，除了较大型的都市以外，三四线城市及其乡镇在日常文化方面都与乡村民俗活动保持着近距离的关系。而形成于斯服务于斯的民俗音乐文化品种，其实就是当地人社群生活的组成部分。民俗音乐文化的发展脱离不开当地文化生态变化的牵引而自成体系，也就是说，无论作何选择都要建立在保持区域性乡村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随着现代化的影响，古老民俗中的节庆活动、信仰仪式活动等逐渐在淡化，使之依附于其中的民俗音乐活动不得不寻找自我发展的空间。但问题的存在也呈现着两面性，一方面是民俗音乐文化在独立发展上趋于演艺化之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艺术化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民俗活动淡化导致的民俗供养力度的减弱，使之民俗音乐文化落入无所依从的境地，同时也在不断地遭受着流行音乐文化及其文化时尚的浸染和侵蚀。民俗音乐文化的本体性特征逐渐消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从从业者主体（或言传承人）的大量流失，以至于青黄不接、难以为继。

三是民俗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向性生存拓展。民俗音乐文化的基本定位是与乡村民俗活动的建构不相分离，然而，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乡村社会的民俗环境变化了，人们与民俗的关系也在悄然地改变。民俗已不再是维系乡村社会的固态化精神生活保留，而只是乡村社会逐渐空巢化的历史记忆或印象。保留和维护一定的民俗音乐文化活动，提供的不只是加深乡村生活印象，而且也在延伸着乡村生活的意义。但需要关注的是民俗音乐文化要与现代乡村社会的变迁步调一致，在过去它或许是乡村祭祀的一部分，现而今可能就是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过去或许是节庆活动的演艺主体，现而今可能已沦落为少数人热衷的自乐形式……民俗音乐文化发展在乡村社会环境中，脱离不开供与求的文化关系，更不可能独立于乡村社会格局的变化，因此，要有适宜自身发展的多向性选择。

二、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的开放理念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尊崇，为民俗音乐文化寻找新的发展生机提供了宽阔的认识理路和思想依据。如何在其中有所施展，不同的区域文化环境，不同的乡村人文基础，乃至不同的乡村经济条件等，都可能是制约或促进民俗音乐文化做出多向性选择的基础和条件。一方面它给民俗音乐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会形成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以下三点值得深思：

一是体现在思想立意上。“一带一路”不是个单一的概念，它是延续了千余年以来人类在频繁交往中获得共相繁荣的经验基础上，广泛借助现代文化资源，宏观构架和尽力开辟发展通道的理想愿景。沿着“一带一路”多民族、多国家、多区域文明荟萃、差异相交、和而不同，一起打造现代文明的果实。因而，区域、民族文化的特色性尤显可贵，这就为民俗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是体现在文化辐射上。“一带一路”不止在政治、经济方面谋求，更需要文化方面多方谋求。现代经济社会、信息社会，在提供人类生活极大物质方便的前提下，文化“同质化”日趋严重，导致现代文化逐步在丧失其丰富性和特色性。处在高度文明和快节奏紧张环境中的现代人，更渴望早已消失的农耕社会才具有的田园松弛。物质环境变异了，回不去了，但文化的类型和品种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延续和保留，使得人的精神疏导有所依归。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民俗音乐文化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气韵灵动”作用，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随便以破坏传统文化法则与秩序为代价，进行随意的拼贴及嫁接，而虚妄地搞出只求表面奢华不求内涵、神韵的“应景艺术”了。所以，有着文化前瞻理想的城市发展，一定少不了对本区域民俗乡土音乐文化的呵护与保留，这必然对民俗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机遇。

三是体现在文化的关联性上。“一带一路”是个经济文化发展的宏伟构想，必将呈现出连带机制，每一种相关联的文化艺术现象都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就是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区域繁荣，既有建基于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主流艺术，也有建基于传统乡村民俗文化基础上的乡土艺术；既有职业艺术家精心打造的原创艺术，也有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并热情参与的民间艺术等，以

此形成诸多类型、多种层次交相呼应的整体文化景观。而在其中，区域的特色性就变得尤为可贵，而这正是民俗文化艺术得以赢人的最佳之处，也必将给民俗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机遇。

有机遇就会有挑战，而从民俗音乐文化面临的挑战方面来看，也有几点不容忽视：

一是如何应对日益剧变的乡村文化环境。近年来每到春节之际就会在网上出现大量返乡见闻类文章，而各网站有关乡村消失或有关反映乡村问题的文章也是屡见不鲜，其他诸如报纸、期刊类媒体上也在不断地刊布涉农方面的报道，可见农村问题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中不可避免尖锐节点。其中包含的核心主题是伴随着中国乡村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人口锐减、传统村庄迅速消失，以及以乡村为依托的传统文化的不断消亡。《参考消息》2014年2月7日以《法报：乡村数量剧减 中国祖传文化或消失》为题，报道了法国《费加罗报》刊登的法国人帕特里克·圣一保罗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奔向城市的急行军》的文章让人惊目，作者说：“伴随中国城市化的急行军，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乡村以无度的节奏消失。而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祖传传统和历史也随之消失。”该文援引了天津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还有370万个乡村。2010年，中国乡村数量削减到约260万个。乡村以每天300个的速度消亡。”该文还报道说：“最近几年来，中国研究人员同样承认了乡村所提供的文化遗产：歌曲、舞蹈、仪式、武术、厨艺等。汇编了近一万个‘不可更动’的文化遗产名录，其中80%在农村。”同时该文还援引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李华东(音)的观点，他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乡村数千年来历经战争和灾难而存活，但却在和平时代因拆迁或领导者的短视而注定要消亡。……中国的现代化和物质主义竞赛导致国家陷入‘精神与道德的危机’。……在古老的农村社会，我们拥有以家庭和紧密关系网为支撑的道德价值观。这一切都被清除。我们文化的基因在乡村。乡村被摧毁，中国人就不再是中国人了。”再看看其他报道，^①《千龙网》2011年10月28日刊登有李旭鸿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农村人口减少 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的报道，其中援引了《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

^① 参考消息·中国频道·刘卓编译《法报：乡村数量剧减 中国祖传文化或消失》，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207/344128.shtml>. 2014-02-07

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报道中说：“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报道还例举了山西的一个村庄——赵家沟村的情况：“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2015年10月8日，《南方周末》借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①颁奖活动，专门跟踪采访了首位获奖者著名作家贾平凹，记者朱又可发表了一篇题为《贾平凹：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②的采访报道中，记录了贾平凹对现代农村的认识，“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没有人怎么建设新农村？”贾平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一百年来中国乡村一步步失去了过去积淀而成的秩序，比如乡贤、宗族、宗祠、庙宇和孔孟之道。”

③

笔者近年来在进行陕北音乐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也走访了不少陕北乡村，既见过即将消失的村庄，如榆林横山县艾好峁乡壑则塬村的方庄仅剩一家住户；也见过因庙会活动带动方圆几十里、几十个村庄踊跃参与的情况，如横山县马坊镇的“牛王会”。与之相对应的是，凡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一般人气都较高，无论外出打拼还是留在村中做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有条件有能力了，都希望无论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乡村活动，都要把事情办得红红火火。比如马坊的

^①转引自网易新闻·李旭鸿《中国农村人口减少 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
<http://news.163.com/11/1028/03/7HE2TLEQ0001124J.html>.2011-10-28

^②“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由木垒书院主办，以国家丝绸之路战略为大背景，关注中国乡村文化精神建设，关注丝绸之路沿线文学艺术，每年评选一次，奖励那些对中国乡村文学、乡村绘画、乡村音乐、乡村设计建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被称为“中国最接地气的乡村文学艺术奖”。2015年8月29日，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乡村文学艺术奖”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木垒书院颁奖，著名作家贾平凹摘得殊荣。

^③南方周末·文化·朱又可《贾平凹：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106>.2015-10-08

^④参见拙著《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

“牛王会”，从历史渊源来看，起自明成化年间（1471），较为久远；从文化环境和生态来看，涉及方圆几十里五乡四十一村；从所需资金来看，办会采取广泛集资的办法；而期间还有马坊富商王荣的推波助澜，先后出资 2000 余万元，整饬和新建“牛王会”诸神的供奉地——马坊华严寺等。正是悠久的民俗传统积淀、村民的热情参与、有效的经费募捐和赞助以及富绅的慷慨解囊，使之“牛王会”这一带有祭祀、超度意味的陕北传统庙会，在近一二十年越办越火、影响深远。

①

从上可见，各地乡村的情况虽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同数据反映出的乡村社会逐步在萎缩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国从过去农耕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问题的要害正如李旭宏报道中所说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农耕文化在随之消失”。民俗音乐文化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演艺所用的乐器、表演的曲目和内容、以及与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草台表演方式、与民共乐的审美趋同等，都显现着典型的农耕文化特征。如果传统的广大村落一个个地消失了，那么依附于其中的传统文化、民俗活动将何保存？无论中国人还是法国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正如古老的一句谚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怪乎，我们的“非遗”工作几十年来倾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取得的效果却不见得理想，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传统文化的颓势。这就说明，文化的存在、发展不是单一的，有着复杂的多向性关联。仅在一个方向上着力，往往事倍功半。

那么反思中，我们除了关注受保护对象或品种的内在价值外，是否也应该把目光放大一些，多思考一些乡村社会变革的路径及其所连带的文化关系，能否在传统文化接受保护与新的社会文化需求之间寻找一些链接点。以变死的保护为活的激发，如此，我们的工作才会更加有效地进行和发展。

二是如何在保护与利用中寻找合理机制。有学者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既是对文化的传承，又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增进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促进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同时保护文化遗产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作为历史的积淀和见证，文化遗产可直接激发人们的历史记忆，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

①参见拙著《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生资源。”说得真好啊！这些重要性以及文化意义，笔者相信任何一个对传统文化稍有情感^①的人，任何一位进行理性思考的研究者都不会否认这样的认识且要报之以赞同，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做。

毫无疑问，传统乡村民俗文化中保留下来的品种多数都在非遗保护的视野中，但正如前文我们说过的，非遗保护自有其约定性，很难照顾到全部，更不可能解决传统文化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如何在保护中使得传统文化获得新生机，发挥其应用的价值，就得需要在非遗保护及其游戏规则上进行更多的拓展。比如有学者提出“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力度。充分梳理‘一带一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其数据化、在线化，形成‘一带一路’文化资源数据库，活化‘一带一路’珍贵的文化资源。”其中利用网路手段对其进行储存与宣传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这也是世界非遗保护自倡导以来所做的工作之一，但我以为该段引文中的后一句话“活化‘一带一路’珍贵的文化资源”似显更重要，遗憾的是作者对此并未展开。其中关键词“活化”，意味着通过外部的有机能量使其迁跃到更高级层面，从而进入活跃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传统文化在当下环境下获得新的生机。

传统的民俗音乐文化如何走向“活化”？应该说自20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其中也不乏成功之举，据此也催生了不少新的艺术品种。如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音乐与秧歌剧乃至中国民族歌剧；甘肃陇东道情与陇剧；东北二人转与吉剧；满族八角鼓与新城戏……这些“活化”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地注重了改造、创新的一面，而淡化了传承的一面，是依照“拿来主义”的方式，从传统文化中抽取可用部分，为艺术新创造获取资源或素材。这种带有某种“拆解式”的“活化”是现代传统文化保护所不提倡的，现代传统文化保护受非遗思维影响，更关注其文化存在的本质性特征及其样貌的保留，也即坚守着“文化地质”意义，并且把艺术创新与其分离开来看待，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活化”变得异常艰难。比如国际上通行的博物馆式的保存，就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它不倡导“活化”只考虑保护、保存，其优点是有益于对原汁原味的维护，但缺点也显而易见，越保存越远离现代社会生活。而另一种通行的做法就是对受保护品种及其源生地的整体支持与保护，有一定的“活化”意思但还上升

^①朱尉、俄洛日哈《“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探析》，载《今传媒》2015年第12期。

^②刘京晶《加快一带一路文化建设 搭建共生共荣文明桥梁》，载《文化月刊》2015年第16期。

不到其真正的层面，现我国大多数非遗项目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其优点是不脱离源生地，有利于维护艺术品种与当地文化的生态关系，但缺点同样显而易见，就是艺术品种易受周边文化的干涉与侵蚀，特别是流行、时尚文化的影响。这就回到了前面我们所谈的问题上——乡村环境的解体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尽管前景如此严峻，我们还是要在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中寻找合理的机制，否则，“一带一路”倡导并开创的大好局面，岂不又要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

有人这样说道：“文化遗产收藏于民间，扎根于民间，与民众生活密切相联。所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一项长期的全民接力工程，才能使文化遗产得以保留，使遗产保护工作得以持续发展。”这段话的基本意思不错，但我想对其进一步引申。所谓“扎根于民间，与民众生活密切相联”^①就是在提醒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在民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一点。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一项长期的全民接力工程。”这虽然是在强调文化保护工作的全民性，既然属于全民性，就要有一个全民全面提高对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问题。但我更愿意从中看出这里是在强调不同社会阶层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如何统一意识、如何提高的问题。近年来，各地在传统节庆期间大打保护传统文化牌，不惜花费巨金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其实老百姓并不真正买账，虚假的传统文化复兴不如实实在在地、长期有效地做些扶持工作、支持工作。如果能把政府支持、艺人努力、学者参与、社会关注有机地构架在一起，恐怕才能真正对传统文化的“活化”做些事情。于此，不难找出一些成功的例子略作分析。

2016年春节前后歌手谭维维与陕西华阴老腔合作的《华阴老腔一声喊》几乎引爆了各大媒体，其实这只是流行音乐与乡土音乐联姻的一次尝试。华阴老腔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逐渐从一个乡村皮影戏走进公众视野：1994年著名导演张艺谋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在剧情铺展中直接把镜头对准“亮子”^②后边皮影戏演员的表演，主演葛优扯着嗓子的高唱，真实地反映了华阴老腔的表演情况；2006年北京人艺根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白鹿原》中，为了展示过去关中农村的真实生活，导演直接把华阴老腔及其艺人搬上了舞台，

^①朱尉、俄洛日哈《“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探析》，载《今传媒》2015年第12期。

^②皮影戏表演所用隔亮幕布的民间称谓。

导演的刻意安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有此对外展示的绝好“机遇”，但实际上，即使在2003年前后，真实生活中的华阴皮影——老腔的处境依然并不乐观，“5人演戏，只有2名观众，其中一人还是监工的”。而真正把华阴老腔推进公众视野，除了前引两个事件外，更重要的应该是老腔艺术在表演上的刻意“变形”，即艺人门抛却“影人”，拨开“亮子”的遮挡，在舞台上以独立坐唱的形式大显身手的表演。

尽管，现在的老腔艺人有时还演一些皮影戏，可较之于舞台上的演出效果和影响，皮影戏似乎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种被一些人誉为“东方摇滚”的戏曲伴唱从此华丽转身，赢来了新的艺术创造生机。其实，戏曲音乐的这样“放单飞”并非老腔独有，20世纪以来我国音乐界在不同时期就有过不少的尝试，而过去民众社区艺术活动中的戏曲清唱也多有此类做法，所不同的是老腔的舞台表演除了酣畅淋漓、带有些许杀伐之气的高亢声腔曲牌外，还加入不少演艺上的创新，如肢体表演。其之所以惹人眼球，除了保留有乡村土戏的淳朴气息外，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非遗保护的路径下看到了可拓展的通道，以及不输于时尚文化而又能与其混搭在一起的开放品质。但这样的“活化”发展并非没有损失，舞台化的表演虽凸显了特色唱腔和曲牌（如“拉坡”），但弱化了整本皮影戏的唱腔音乐显现，更无须说传统影人艺术的保留。^①

总体说来，老腔艺术的现代“变形”显现出了一定的“活化”出路，舞台化给了它新的创造生机，使之华阴乡土艺术跨出地域界限，以其粗犷的气质、率性的表演为公众所接受。同时，舞台化也为其走进现代人的生活预设了可交融的情境，被不同媒体看好说明其仍然保留着乡村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而能与时尚流行文化相交流，则反映出老腔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张力基因和老腔艺人们愿意吸纳新的文化营养所具备的开放意识。

除了老腔，在陕西更为著名的例子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安鼓乐的表现。与老腔有所不同的是，“西安鼓乐”的依托环境是西安市及其周边县镇，早在清末民初就已活跃在终南山、南五台、西五台一代的庙会中，参与“朝山进

^①朱光《华阴老腔：条凳木块成乐器最是震撼精气神》，《新民晚报》，2008年5月7日。

^②2003年陕西华阴文化馆干部党安华根据华阴皮影戏素材，排演了一出反映农村生活场景的剧目《古韵乡趣》，其中把皮影与音乐剥离，加入手持纺锤的女性角色，以及挂着烟袋敲击木头等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表演成分。该剧成为华阴老腔走向舞台表演的重要标志。

^③老腔曲牌名。

香”“祈雨斗乐”等民俗活动，民间有称为“香会”“水会”的。因其音乐曲牌的丰富性和典雅气质，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受到音乐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几十年来，西安鼓乐的研究、保护与传承也因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政府助力，无论在乐谱整理、表演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以西安鼓乐音调为素材进行的新作品编创也多有积攒，民间乐社经过多年的积累发展目前也有“六大古老乐社”之说，这些乐社承传着西安鼓乐僧、道、俗不同的风格流派。应该说西安鼓乐在多方面的文化发展基因支撑下，其多路径的走向显现出一种多样的“活化”态势，其中，既有民间艺人的热情坚守，也有学者的科学梳理；既有政府的文化助力，也有作曲家的创作汲取，当然更离不开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因此，西安鼓乐在几十年的继承发展中，无论其艺术水平抑或文化价值都得到了有机保护和不断提升，甚至被比附为“文化的活化石”。近些年来，西安鼓乐各乐社除参与政府文化部门组织的活动外，一些乐社还有依靠社区文化地理条件进行多向性文化拓展的尝试，如东仓乐社与西安大唐芙蓉园的固定旅游场所展演；周至县南集贤东村、西村鼓乐社在当地财神庙的行乐仪式表演等，通过参与这样的活动，既为乐社赢得了固定收入同时也扩大了西安鼓乐的社会影响。而何家营鼓乐社还曾尝试将鼓乐演奏引入小学音乐课堂；东仓鼓乐社、南集贤东西村鼓乐社也在适时地进行着乐社新学员的补充与教育。但从整体上来看，西安鼓乐社的造血功能仍显不足，一方面是现存六大古老乐社并非各个有出路，其中有一半一年中基本无条件举办像样的活动，仅靠非遗项目的微薄资助聊以维持；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高校研究机构都缺乏更全面和更妥善的拯救与发展规划，以至于西安鼓乐的名头虽大，但各乐社内部发展实际上已显力不从心。

这里仅仅列举了在陕的两项民俗音乐文化个案进行分析，其中既可看到欣喜的一面但更有令人扼腕堪忧的情况存在。如果再联系整个三秦大地上现存的几十种民俗音乐文化发展情况的话，就更不容乐观了，处在濒临灭绝状态的品种也不在少数。当然，民俗音乐文化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在工业信息时代与社会难相合拍有其先天的原因，但不具应变能力，跟不上时代步伐，缺少“活化”出路，实际上是其被不断边缘化的基本前提。在当下文化环境下如果不再在保护与利用

中寻找合理的机制，促进其进行更多的“活化”，那么，民俗音乐文化的分崩瓦解只是早晚的事情。

作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存在，我们应该从民俗音乐中看到其有机成分的存在，这就是传统文化所共有的道德引领、审美感化和趣味培养，而这正是我们保留中华文明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如果连这起码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中华文化将以何面目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时代越是要求每一个人需要接受全人类的知识，民族的文化境界对他未来的创新生活越是重要。”无疑，区域民俗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作用是绝无替代的。^①

（本文根据2015年11月福建泉州“第十四届亚洲艺术节·文化论坛”发言改写而成）

2016年3月5日初稿

2016年4月6日二稿

2016年4月10日修改

——原载《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

^① 谢嘉幸《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